

蕭殷論

王羲之題

賀朗著

文化出版社

▲ 萧殷在工作



▼ 萧殷塑像



蜡炬精神的礼赞

——序贺朗同志的《萧殷论》

唐 因

贺朗同志继《萧殷传》之后，又完成了专门论述萧殷同志文学理论批评工作的文学评传《萧殷论》。这是很有意义的。

作为一位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萧殷同志一生致力于文学新知识的启蒙，对文学青年的辅导，以及对文学理论的探索、建树和抗争，孜孜不倦，循循善诱，呕心沥血，奉献终身。他的作为文学的耕耘者和战斗者的功绩是不会磨灭的。今天，回顾他的一生，重温他在文学理论的普及、开拓方面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及他在扶植青年作家和从事艰巨的理论斗争方面的胆识和勇气，我们都将从他的高尚精神和刚直品格受到激励和鼓舞。而且，萧殷同志在文学理论——文学典型论的研究和开拓上，他的理论建树对于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仍具有直接的、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我以为，这正是贺朗同志撰写此书的立意所在。

读着这本书的一些章节，不禁令人缅怀和萧殷同志相处的那些日子。他在解放区时就已经从事文学理论的研究、文学新知识的普及和青年写作的辅导。那时我在国统区读完大学文科后，又就读于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萧殷同志是我的老师，讲授创作方法。他给我的初次印象，是一位质朴、诚恳，专心治学而又热心引导青年的前辈。几堂

课（包括习作辅导）之后，我开始感到他很不同于我过去受业的“经院派”的教授们，而是我首次接触到的新型的文学教师。他讲的是文学的新知识、新理论，这是我过去知道得不多的。这一来由于我不重视理论，二来脑子里装的尽是古今中外各种杂乱的文学观念，文学的新知识对我很有吸引力。他的教学方法也不是简单的概念灌输，更不是各种思想资料的罗列，而是从文学创作的实践出发，从对文学现象的分析出发，来论证文学这种思想形式的特征和规律。由于战争和土地改革的高潮，我们学习的时间很短，但是这样的讲授，比我在大学几年中学到的还要切实得多。

萧殷同志是研究和崇尚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他讲授的创作方法论的核心思想是文学典型论。后来我逐步认识到，创造典型的规律是文学这个容于美学范畴的思想形式先天的、基本的、普遍的规律，不限于现实主义。其他的文学思潮、流派也是以不同的途径、手段来进行对具有自己独特素质的文学典型的追求的。对于文学典型论的学习，使我开拓了视野，获得了基础知识，是我后来参加文学编辑、评论工作的必要准备。这应该归功于萧殷同志的亲切指导。

萧殷同志的讲学方法，也是新型的。除了从实际出发的理论讲授，他还特别重视对学员习作的辅导。他从对你的习作的剖析入手，上升为文学创作方法基本知识的启迪。他从不讲什么“文章作法”，或舍本逐末地讲写作技巧，而总是从习作的社会、思想意义，从人物、情节、细节的典型性出发，评论习作的优劣，以提高你对文学素质的理解与追求，提高你的认识水平和写作能力。那时我一心想从事文学写作，由

于他的引导，使我开始知道应当怎样走向文学之路，坚定了我投身文学的信心。

随着贺朗同志书中的描绘，我的回忆也在继续。进城后，由于工作需要（那时，“工作需要”是高于一切的），我出乎意料地被调到正在筹备创刊的《文艺报》工作。这是一家理论批评刊物，还是什么“机关报”，我虽然对理想遭到挫折“毫无怨言”，却总感到不大适应。因为我认为文学是一种形象思维，而理论批评跟我的思维习惯和志趣格格不入。但是，另外一方面，由于陈企霞、萧殷同志是当时《文艺报》的负责人，都是我的老师，使我觉得有了依靠；同时，工作中接触的大量事实也逐步吸引了我。

解放之初，青年们要求得到新知识、接受新思想的愿望非常强烈，求知的热潮汹涌而起。文学青年很需要文学新知识的启蒙和普及。因为，除了来自解放区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和知识青年，以及原在国统区接触过一些新文艺理论的青年而外，许多爱好文艺的青年大都缺少新文艺的基础知识。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问一个为什么。那时，编辑部每天的来信、来稿（当时《文艺报》除评论外还发表作品）中，就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要求回答。“什么是文学？”“文学写作要靠灵感吗？灵感是什么？”“怎样写小说？”“怎样描写人物？”“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能不能写小资产阶级？”数不清的这类问题，回答起来很不容易。那时编辑部是坚决主张“每稿必退，每信必复”，对读者必须亲切诚恳，决不可敷衍冷淡的，而要认真回答起来，每个问题都足够写一篇论文，或一部书。不仅时间不容许，也是我们这些同样也是青年的编辑难以胜任的。面临困境，萧殷同志给了我们帮助。他告

诉我们，不能就事论事地问什么便回答什么，而要从读者提问的态度和方法入手。他自己示范，针对一些青年以为简单地知道了“是什么”便算获得了新知识的想法，告诉他们要理解这类问题，先要多读一些文学名著，也读一点当时可以找到的文学入门书，通过自己的感受、体验和思考，才能有切实的收获。对于“怎样写小说、诗歌”一类问题，回答时也讲到小说、诗歌的一些要素，同时告诉他们，靠“小说作法”、“诗歌要诀”之类是写不出作品来的。至于能否写小资产阶级等等问题，都属于对新的文艺思想不理解，就只好就当时我们所知，作出解释。那时的解释，现在看来很可能是简单、片面的，例如我们那时大概还不敢十分肯定地说“小资产阶级”也可作为作品的“正面主角”之类，大概还要十分强调写“小资产阶级”在工农兵教育下的“改造过程”。但是这类问题，很能启发我们思考，成为我的认识上的积累。过了一段时间，这类问题少了，而关于如何体验生活、如何塑造典型、如何撷取题材、提炼主题一类的问题多起来了，思索和回答这些问题，也使我在认识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境地。这方面的工作，对我们一些青年编辑来说，是提高自己的水平和思维能力的极好的锻炼。

那时在作品的来稿中，绝大部分是初学写作者的习作，能选用的很少，但在“每稿必退”的要求下，对每篇退稿都要作出尽可能中肯的评论，以及退稿或寄回修改的理由。这是很费脑筋的，因为不但要说得有道理，让人接受，而且不可挫伤青年的写作热情，就是对文理不通者亦如此。

萧殷同志辅导学员习作的态度和方法给了我启发。也是在他的示范和指导下，几年中我就处理过大量这类稿件，一

天下来，有时头昏脑胀，但是对于提高我的分析作品的能
力，也是一种极好的锻炼。

《文艺报》当时开辟的《读稿随谈》一栏，就是为回答读者
的一些有普遍性的问题和谈论青年写作中的一些通病而设
的。萧殷同志一方面注意选择我们的一些复信，在此栏发表，
同时要求我们要善于抓住来信、来稿中一些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作综合性的较有系统的回答。这个栏目当时办得颇活泼，
也有实效。从这里，我开始感到做文学理论批评刊物的编辑并
不枯燥，它有丰富的内容和广阔的思维天地，使我开始对文学
的理论批评产生了兴趣。这虽然改变了我爱好文学的初
衷，在思维方式上仍有格格不入之处，但是至今想来，却也
并不怎样后悔。

往事如烟。如今看来，那时所做，很有一点“手工业方
式”，但在那个特定的时期，针对青年的学习热望和当时新
的思想资料相当缺少的状况，这种启蒙和普及工作还是有意义
的。在这个工作中，正体现着萧殷同志一生扶植文学青年，
帮助他们走上文学正路的高尚精神。这种精神，如今似
乎是日见其淡薄了。现在流行的，是继过去的一概打、杀之
后，作一味的阿谀，而据说，这乃是“八十年代”的新风
尚，国中和之者甚众。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怀想起萧殷同志
的诚恳、热情而认真的面容，真是恍如隔世了。

在勤恳地从事文学新知识的启蒙、普及的同时，萧殷
同志对青年作者的辅导也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可说是费尽心
血。后来，我和萧殷同志已不在一起工作，许多事情未曾亲
历，但是从当时感知的消息中，就可以想象，当他发现一个
文学青年不算成熟的作品中有价值的原素和光彩的片段，是

如何欣喜，又如何竭诚以待地帮助他，将作品铸造得更为有力动人。我很能理解一些当年的青年作家，在后来提到萧殷同志时那种深切难忘的感情，因为我对他也是怀着同样的深情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运动的迭起，原来就存在的文学理论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日见其抬头，并肆虐于一时。原来被奉为经典的一些观点，有的被曲解，有些原来就有片面性的论点被无限夸大，有些原来就是不科学的观念被推向荒谬的极端。“古典的”新现实主义理论日趋“异化”，演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这种理论上的恶化与退化，和对于文艺的极不明智的干预（后来竟是摧残）相结合，就使中国的新文学从理论到创作都开始进入了一个艰险的、被扭曲了的可悲时期。那时，萧殷同志虽然由于并未直接处在斗争的“前哨”，没有被强行卷入（今天看来，宁愿那时他未被卷入，因为那是一个生死之地，并不适宜正常人类的生存），但是他还是挺身而出，从早些时候对于杨朔的《三千里江山》的评价，一直到后来他主持的对于于逢的《金沙洲》的讨论，都是他对于“左”倾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抗争。从对于有关典型问题的种种曲解的辩驳，一直到后来对于“三突出”、“主题先行”等等谬论的批判，都显示了他作为一位正直的有真知的评论家不平常的胆识。贺朗同志在书中对这些都有生动的评述，我是深有同感的。

记得当年，萧殷同志发表他一系列对青年作者谈论创作方法的文章时，也曾听到有人打趣说：“他搞的是文学ABC。”这也许不算是揶揄，却显然是嫌他的理论近于浅显。这自然是很不公正的，因为这种议论显然离开了当时文学开

拓、普及的需要和青年们求知的渴望。能做到深入浅出，无论是作为启蒙，或是对理论的深入研讨，都是必需的。经院派的深奥文风未必就是最好的文风。初学者能从“文学ABC”走向健康的文学之路，不正是必要的基础吗？离开了这个基础，煌煌如碑的史诗和高耸入云的理论巨著又从何而来呢？何况萧殷同志对于文学基本规律的探讨，也从未停留于“文学ABC”的领域，而是不断扩展、丰富并且深化的。

有趣的是，到了1979年，恢复后的《文艺报》召开全国性的文艺理论批评座谈会，大家沉痛回顾十年浩劫，并上溯源流，提出了文艺上一大堆变态、错乱、颠倒的命题时，一位同志忽然语惊四座，说：“原来都是些文学ABC！”这时，我忽然想起了那时在广州的萧殷同志。看来，人们要得到一种似乎是ABC的认识，也是很不容易的，有时要付出多少血泪！犹如“本地区明天早上实现共产主义”，就大为风行过，待到一切毁坏，大饥馑席卷中国，才似乎开始明白了一点点；然而终于还是不明白，还要乐此不疲地制造种种动乱，以便“早日”进入共产主义。这一切，离“共产主义ABC”远甚，但是要弄明白，我们付出的代价还少吗？

现在，有趣的，或者说不幸的是，科学的“文学ABC”似乎还要大大提倡。今天的文学思潮处于一个活跃时期。文学见解纷纭，文学理论不断有所开拓，有所突破，这是文学发达的标志。但是，闪光的未必都是金子。当文坛上充斥着种种显然是抹煞文艺素质，违背文学规律的所谓“新观念”，而这些“理论”又被大肆吹嘘的时候，就不能不使人忧虑了。“无主题、无人物、无情节”，成为小说创作的时髦理论，“反传统、反理性、反道德”，成为一些作家的理论支柱。掂拾外

来观点的一枝一节，便标榜是“国内首创”；早年时兴过但早被实践扬弃了的观念，于今又成为进口的紧俏货，广为招徕，招摇过市，生意兴隆。在创作上，在产生众多掷地可作金石声的佳作的同时，种种畸变愈演愈烈。假文学多样化之名而上市的非美学、非人性甚至反美学、反人性的“作品”，在某些刊物上琳琅满目。似乎，主张饭不应从嘴里吃而应从耳朵里吃的观点，也可以是一种理论的“创新”。似乎，兴味盎然地描写种种生理刺激和欣赏邪恶趣味的文字，都是新时期文学的“突破”。似乎，玩世不恭，混同善恶，颠倒美丑，便是文学的“新观念”。心理的变形表现为文学的变形。创作自由的庄严要求成为某些人兜售伪劣产品的理由。可悲的是，在一片赞美声中，出来做一点求真辨伪、扶优抑劣的工作的人不多。文学评论家们应有的责任感和胆识到哪里去了呢？思念及此，使我不由得又怀想起萧殷同志。但愿多少年以后的某一日，我们回顾今朝，不再发出“原来都是文学ABC！”的感叹。不要在庸俗社会学的时代之后，再来一个社会庸俗学的时代！

萧殷同志的理论工作是不断开拓、深化和发展的。几十年中他对于文学典型论多方面的探索和论述，是在对于庸俗社会学的争论中不断丰富、逐步完成的。人的认识总是带有历史的、时代的局限性。我们那时大概谁也没有料到，“左”倾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居然会发展到后来那种可怕的地步。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革命文学家、进步的文学大师对文学的种种见解，可是，那时我没有想到，科学的艺术原理可能被曲解；在阐述中，某些原来不完备的论点可能被扩大；也可以为了某种政治的需要而舍弃原理，却仍然

标榜是出自经典。越过真理一步即成为荒谬，何况原来被崇奉的未必皆是真理。把文学当成政治的工具，文学是光荣榜，文学是表扬状。只准歌颂，不准暴露。“典型”就是先进标兵、英雄人物，高大完美，人人学习。“典型环境”就是先进单位、模范地区，莺歌燕舞，人人赞颂。正面现象才是社会的“本质”，“典型”等同于人群的多数和阶级代表。凡被认为不符者皆是歪曲了“本质”，触犯了天条。动不动便是“歪曲了工农兵形象”，“污蔑了社会主义制度”，罪恶滔天，应予制裁。愚昧而狂暴的棍子漫天飞舞。所有这些，在建国之初，有谁曾料到过呢？对此，许多作家、评论家在当时的条件下做了力所能及的抗争，萧殷同志就是其中坚定的一个。他决不能容忍那些篡改、违背科学的艺术原理的东西。他的创作方法论——文学典型论，也就是在这长期的斗争中发展、建立起来的，经过同各种各样的理论扭曲、颠倒的论争，丰富和深化了他的理论，使他早期的某些观点日趋于完备周密。

萧殷同志在他的著作中提倡革命现实主义，主张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是他从未把现实主义看成是一种封闭的、排他的思潮。他钻研文学典型论，正是想从文学的核心问题上揭示文学规律的一些基本观念。他的文学观念并不具有保守的倾向，而是不断发展的。如果他后来身体健康，并能假以天年，他在文学理论批评工作上将会有更多的成果。

萧殷同志去世时，我曾拟一联以献，文曰：

蜡炬精神 园丁心血

马列绳墨 引路文章

人间如此广大，可以吞咽无尽的污垢血泪，人间又是如

此浅小，有时似乎盛不下多少母慈友爱、浩然正气、侠骨柔肠，有了便溢出，使人神伤情动。当时心境沉郁，未写成悼念的文字。现在读过贺朗同志此书，作者又嘱写一点感想，乃说了上面这些话，也当作是对我的老师萧殷同志的追悼和怀念罢。

……

……

……

……

……

编者注：唐因同志现任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院长。

前 言

萧殷（1915—1983）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文学评论家，是文学新理论、新知识的启蒙者和普及者，他又是一个在文学园地辛勤浇花育苗的园丁，一位坚定捍卫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战士。在他近五十年的文学生涯中，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为新中国的文学新理论、新知识的启蒙、普及；为文学理论的探索、开拓、建树和抗争；为辅导文学青年，造就一代文学新军，发展和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用自己生命之光，为后来者照亮了通向文学之路，从中表现了他一生的蜡炬精神。

萧殷自少好学，在小学时期就阅读我国古典文学，以及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作家的著作。在初中一年级时，他就开始文学创作，并和高中的同学办了一个文学刊物《湖畔》，利用这个刊物联系文学爱好者，他自己也在刊物上发表文章。

后来，萧殷到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读书。他一边读书，一边继续文学创作，曾先后在广州《民国日报》、香港《珠江日报》等副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散文和杂文。尤其是他后期写的杂文，抨击时弊，揭露旧社会的腐败和黑暗，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他在广州参加了“一二·九”等革命学生运动，

他和当时进步的文学艺术家们，参加党领导的“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进步组织。由于他参加革命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反动当局追捕。1936年冬他同赖少其逃到上海。1938年夏流浪到武汉。同年7月，他投奔延安。

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学习后，认识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给文学青年进行文学新理论、新知识的启蒙、普及工作，引导他们走上文学正道，为繁荣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于是，他决定放弃文学创作，从事文学理论工作，并把这个工作，作为自己一生的崇高职业。

萧殷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毕业后，被派到太行《新华日报》任编委兼通联科长，他办了一个油印刊物《通讯与联络》。他利用这个刊物，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去辅导文学青年写作，帮助他们走上文学正道。

之后，他在解放区先后负责《晋察冀日报》、《冀中导报》、《石家庄日报》等副刊的主编工作，后来又调到华北联大文学系教书，讲授《创作方法论》。在当时资料欠缺的情况下，他利用刊物阵地和讲坛，孜孜不倦地对文学青年进行辅导。

新中国成立后，萧殷负责《文艺报》主编和《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以后又调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副所长、中国作家协会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这时期正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理论建设的时期，对文学青年进行文学新理论、新知识的普及工作，既重要又艰巨。因为，解放之初，除了来自解放区的各类文艺工作者和原在国统区的一些进步文学青年外，广大的青年还没有接触过文学的新理论、新知识。当时旧中国的大学里讲授的文艺观是杂七杂八的，什么

都有，从“文以载道”一直到“为人生而艺术”，以及“平民文学”（“五四”时某些人提倡），五花八门。当时社会上也没有较为合理的文学理论和知识的书籍，有一些西方来的《文学概论》之类，并不能使青年获得新的知识，那时还没有一本如《大众哲学》那样的文艺普及读物。后来就是有一些文艺读物，也是在萧殷从事文学新理论新知识的普及工作的若干年以后才出现的。

在萧殷面前，是一片正待开垦播种的处女地，是培育新文学爱好者、文学新人的一个开拓性的时机。于是他就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积极耕耘，锲而不舍，做出了贡献。不管他在《文艺报》编务工作中，也不管在文学讲习所的课堂上，不管在负责辅导青年作家的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里，他都是兢兢业业地对文学青年进行文学新理论新知识的启蒙、普及工作；他孜孜不倦，循循善诱地对文学青年进行辅导，培养他们成长。

当时萧殷根据文学青年要求新知识、接受新思想的强烈欲望，便利用《文艺报》这个阵地，给文学青年进行细致的启蒙和普及工作。开辟《读稿随谈》一栏，从读者提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入手，给他们解答文学创作上的各种问题。萧殷还针对当时的文艺思潮，发表“普及与提高”、“评《红旗歌》”、“评《三千里江山》”等文章，对当时的“左”倾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进行批评。

后来他到了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和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仍然专心研究文学青年的创作问题，给他们进行普及和辅导。当时王蒙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就是在萧殷的辅导下修改出来的。

萧殷的启蒙、普及工作的方法，不是简单的概念的灌输，更不是各种思想资料的罗列，而是从文学创作的实践出发，从对文学现象的分析出发，来论证文学这种思想形式的特征和规律。他重视对文学青年习作的辅导，从习作的剖析入手，上升为文学创作方法基本知识的启迪。他从不讲“文章作法”，舍本逐末地去谈什么写作技巧。而总是从习作的社会、思想意义，从人物、情节、细节的典型性出发，评论习作的优劣和问题，以提高作者对文学素质的理解和追求，提高文学青年的认识水平与写作能力。

应该指出，当时萧殷对文学青年进行的启蒙和普及工作，是受到历史局限的。正如上面谈到的，当时宣传新文艺思想的资料不多，他主要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理论依据，而他对《讲话》的观点又是全盘接受的。实践证明，《讲话》中有许多观点是正确的，但也有一些观点具有片面性或不够科学的。在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的源与流，继承和创新，生活和典型等等问题上，还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当时萧殷在工作实践中，也察觉到一些问题，例如关于典型问题，有人把“典型”说成是“模范”、“标兵”；把“典型环境”说成“先进地区”；关于英雄人物提出要写“高大完美”，“没有缺点”；又例如有人对《三千里江山》小说给予粗暴否定，等等。他感到“左”倾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在抬头，却想不到以后会在文艺界大泛滥。当时他勇敢地站起与之抗争，但无济于事。

由于历史局限性，萧殷的启蒙和普及工作，只能根据文学青年的迫切需要，从实际出发，用那时他掌握的思想观点

来进行，向他们介绍各种“经典”性的理论。当然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即使那些观点简单了一些，其中也包含一些片面性，但是，从总体上说，当时萧殷给文学青年进行文学的性质、使命、道路、作家的品格、素养、艺术方法的探索等等的普及，对文学青年还是有很大帮助的。不能因为那时的许多观点后来出现种种“弊端”，或走向极端，就贬低当时他对文学青年进行启蒙、普及工作的贡献。

1961年春，萧殷调回广东工作。担任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兼党组副书记，主编《作品》文学杂志。他在自己工作岗位上，仍然对文学青年进行文学新理论新知识的普及工作。为了开展广东的文学理论工作，他在文艺界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他发现“左”倾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在阻碍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工作的开展。于是在省委的大力支持下，他主持开展对于蓬的长篇小说《金沙洲》的讨论。

在《金沙洲》的讨论中，萧殷亲自带头写批判文章。经过历时七个多月的讨论，对庸俗社会学进行了批判，也批判了在文学评论方法上的教条主义，深入探讨了文学典型问题；澄清了文艺创作中的是非问题。通过讨论，开拓了广东文学评论工作的新局面，推动了文艺创作的发展，并锻炼和培养了一支文学评论队伍，为广东的文学评论工作，打下了基础。

萧殷在《金沙洲》讨论中，本身得到进一步锻炼和提高。他回顾过去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结合讨论中出现的问题，他发表了《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文艺批评的歧路》和《艺术构思和作品效果为什么会脱节》三篇长篇评论文章，对关于典型问题的各种错误论点进行了批判，阐述了关于典型问题的正确观点。通过讨论，他的文学理论工作，得到不断